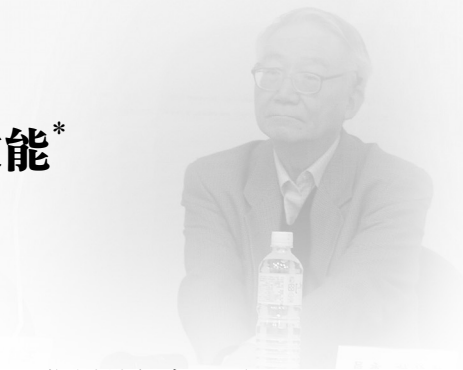


## 近卅年來中國大陸「新史學」發展概況<sup>+</sup>

陳啟能<sup>\*</sup>



首先要說明，這裡所說的「新史學」是指近卅年來，也就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陸發展起來的，受西方「新史學」影響的，與傳統的實證史學不同的史學研究。這個稱謂在中國大陸目前並未通用。它泛指在西方史學的影響下，用新觀念、新視角、新方法、新理論對歷史進行研究和評述的所有嘗試。

中國大陸「新史學」的興起是與廿世紀國際史學發展的基本趨勢相一致的，即由「新史學」逐步取代傳統史學的趨勢。只不過在中國大陸這種趨勢發生得比較晚，發生在七〇年代末罷了。這與中國大陸在這之前的封閉狀況是分不開的。

中國大陸「新史學」的興起和發展雖然與國際史學的發展趨勢是相似的，但是在具體內容、發展特點、步驟方法、形式形態等方面都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加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

和探討就很有必要。

中國大陸「新史學」的發展的特點可以大致概況如下：在史學理論研究的全局性的帶動下，社會史和文化史異軍突起，促進了遍地開花的喜人局面，史學各分支學科進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史學理論研究的全局性帶動作用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史學理論學科本身的發展和完善。全國性史學理論機構的成立，全國性史學理論大會的按時舉行，全國性史學理論專門雜誌的創辦，史學理論課程在大學的設立和研究生的培養，特別是許多史學理論和方法論問題的深入探討和眾多專門課題研究的組織進行，都是卅年前少有的，或者是沒有的現象。這正反映了這一學科的蓬勃發展。

其次是徹底改變了卅年前封閉鎖國的局面，實現了與國際史學的交往和與國際史學界

<sup>+</sup>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sup>\*</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的交流。一九八〇年中國史學會加入了國際史學會並成為理事國，當年並參加了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隻是中国大陸史學家重返國際史壇的一個標記。與國際史學的溝通還表現在大量國際史學中新思想、新流派、新著作、新觀點的譯介上。

史學理論研究的開展是與「史學革新」的實踐同步進行的，因而深受年輕一代的支持和歡迎。史學理論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青年一代的成長，這促使其影響迅速擴大。加上理論方法論本身對具體研究具有導向的作用，因而史學理論研究就對「新史學」全局的發展起到了帶動的作用。

任何一種史學範式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理論方面，更主要的還應表現在研究實踐上。綜觀世界各國「新史學」的發展都與跨學科研究有關，其結果總是新的分支學科的產生或更新。中國大陸「新史學」的發展也是如此。上世紀七〇年代末以後，「新史學」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研究領域，更新了研究方法。眾多分支學科紛紛先後湧現出來或重新發展起來，如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史學史、中外關係史、婦女史、家庭史、計量史、心理史、環境史、全球史等。其中最具有影響的是社會史和文化史。

社會史研究自然在七〇年代以前就已存在，但是此時作為「新史學」的一部分卻有它的時代特色。譬如，它與西方的「新社會史」一樣強調要「自下而上地」觀察歷史，要注重研究社會生活史，要應用新方法等。社會史研究的「民間取向」漸成風氣，日常生活史受到很大重視。我們可以舉出一些著作以說明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的十卷本《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包括夏商、魏晉

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朝、西周、春秋戰國、秦漢、明和清。又如馬新的《兩漢鄉村社會史》、叢翰香主編的《近代冀魯豫鄉村》、魏宏運主編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冀東農村調查》、常金倉的《周代禮俗研究》、徐龍華的《國風與民俗研究》、行龍主編的《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陳支平的《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宗族社會與文化》、王玉波的《中國家長家庭制度史》等等。最近，有社會學家指出，要注意避免社會史研究中的過分細碎化傾向，即專註於歷史上某一個細節，如對一個很小的村莊進行細緻的分析，卻未見微言大義。

文化史也與社會史類似，早已有之，但是在「新史學」的氛圍中，自廿世紀八〇年代重新興起後，十分注重填補本學科的空白和加強薄弱環節，十分關注觀念和方法的革新。在這一時期，在地區文化史（楚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閩粵文化、海派文化等），斷代文化史（遼金文化、秦漢文化等），專題文化史（《禪宗與中國文化》、《方言與中國文化》、《中國雜技史》等），少數民族文化史（《彝族文化》等），近代文化以及文化理論著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到九〇年代時更有社會文化史的崛起。社會文化史的最大特點就是眼睛向下，著眼下層文化、大眾文化和底層社會。進入廿一世紀後，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文化史研究中又出現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潮流。

再說遍地開花。這是說近卅年來史學許多分支學科作為「新史學」的一部分都有了程度不同的發展。例如政治史，原先的政治史比較集中於農民戰爭史、民族史、重大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史，領域比較狹隘。「新史學」的政

治史就打破了這種局限，如白鋼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政治制度史》專攻政治制度，又如華僑史、家族史、會黨史等領域都有較快發展。

有些分支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如心理史學，過去較多的是對外國作品的譯介和評論。現在不少學者開始嚐試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研究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除了對個別歷史人物的心理特徵和個性進行分析外，學者們也注意探討群體的社會心理。學者們為了進行學術上的創新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我們舉彭衛的《另一個世界——中國歷史上變態行為的考察》一書為例。彭衛指出，中國古代史籍中關於精神失常的材料十分豐富，但是十分零散，散見於正史、野史、筆記小說、民歌之中。而野史和筆記小說中的有關記述大大超過正史，然而這些記述更多地來自傳聞，需要詳加甄別判斷。彭衛把材料分成三類兩級加以區別。他把中國歷史上的「人格異常」分成七類，僅「性行為變態的人格異常」一類就包括十八種現象，其他類型的「人格異常」還包括廿種現象。這種分法已遠遠超過了對彭衛有過啟發的美國心理學家克萊克利在《正常的假面具》（1973年）一書中所列舉的十六種「人格異常」現象。

從廿世紀九〇年代末起，受國際史學發展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新史學」中出現了環境史和全球史等新的領域。這表明中國大陸的「新史學」的發展與國際史學的關聯是相當密切的。

最後要強調一點：中國大陸的「新史學」具有自身的特點，具有自己的發展軌跡。中國史學的發展雖然不能離開國際的環境，不能脫離國際史學，但是中國史學的發展必須走自己的路。中國歷史學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悠久傳統，中國有著不同於西方的國情。中國史學的

發展雖然要借鑒國際史學，要引進和瞭解西方史學，但是絕不能簡單照搬，更不能亦步亦趨。這就有一個如何中西結合、洋為中用的問題。總之，我們必須既要深入瞭解和研究西方史學的發展變化，更要結合中國史學和中國歷史的實際進行創新。堅持自身的特色，走自己的路，這是結論。

